



陶渊明名篇赏析

侯爵良 彭华生



陶渊明名篇赏析

Tao yuan ming ming pian shang xi

侯爵良 彭华生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 京 印 刷 三 厂 印 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375印张 170,000字

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6,000

ISBN 7-5302-0051-8/I·52

定 价： 3.15 元

作者介绍

侯爵良，男，生于1937年，四川宣汉县人，196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，现任世界语刊物《中国报道》编辑部副主任。著述有《中华民族七十二伟人》（与人合作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）、《哲人 哲理 哲趣》将由中国建设出版社出版、《中国古代哲学家》（多种文版的《中国建设》从1986年第2期开始连载，已译成世界语，将由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）等。近年来在各报刊发表杂文、散文、文艺评论等百余篇。

彭华生，男，生于1939年，四川开县人，196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，现任《文艺报》文学部副编审。著有《新时期作家谈创作》（与钱光培合作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），并发表了多篇理论、评论文章，主要有《如何改进文艺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》（《文艺报》1981年第5期）、《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》（《文艺报》1983年第7期）、《从生活出发，塑造多样化的人物形象》（《文艺报》1985年第6期）等十余万字。

前 言

陶渊明字元亮，又名潜，世称“靖节先生”，浔阳柴桑（今江西九江西南）人，生于晋安帝兴宁三年（365），卒于宋文帝元嘉四年（427），终年63岁。

陶渊明的一生是在乱世中渡过的：十九岁那年，爆发了东晋抵抗前秦苻坚的淝水之战；二十一岁那年，政治家谢安逝世，司马道子和他的儿子司马元显擅权；三十五岁那年，由于司马道子父子滥施暴政，导致了孙恩领导的十余万农民大起义；三十八岁那年，桓玄杀司马道子，篡位称帝；四十岁那年，刘裕起兵诛杀桓玄，弑晋安帝，立恭帝；五十六岁那年，刘裕代晋称帝。动乱给人民带来灾难，陶渊明的家乡浔阳地区常是统治阶级内部兵变厮杀的战场，又是官军与农民起义军血战的拉锯地区。在陶渊明经历过的岁月里，民族矛盾、阶级矛盾、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，真是“乱也看惯了，篡也看惯了”（鲁迅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）。经历长时期的动乱，陶渊明登上了五言诗歌创作的高峰。

陶渊明是西晋大司马陶侃的曾孙。他的祖父陶茂做过武

昌太守。父亲早逝，叔父陶夔担任过太常、参军等官职。母亲孟氏是孟嘉的女儿，而孟嘉又是陶侃的女婿。孟嘉做过征西大将军桓温的长史。陶渊明仰慕外祖父的庄重儒雅，写了《孟府君传》，称颂外祖父“名冠州里，声流京邑”。庶母所生妹，嫁与程家，晋义熙元年(405)死于武昌；渊明辞彭泽令奔丧，后来写了《祭程氏妹文》。

陶渊明在“而立”之年死了原配夫人，续弦妻子姓翟，翟氏安于勤苦，与渊明志同道合。陶渊明有五个儿子，年纪相差不多，弄得他“幼稚盈室，瓶无储米”(见《归去来兮辞序》)。渊明关心孩子的成长，曾写《命子》诗对孩子寄与希望。陶渊明最好的朋友是颜延之。颜延之比陶渊明小二十岁，渊明去世后，他写了著名的《陶徵士诔》，对渊明的品德颇为称颂，是研究陶渊明的重要资料。据《宋书·隐逸传》记载：颜延之与陶渊明情长谊深，颜延之馈赠陶渊明二万钱，渊明将钱全部存放在酒家，作为长时间的酒资。颜延之是著名的山水诗人，他和谢灵运、鲍照被称为“元嘉三大家”。颜延之与陶渊明虽为好友，但彼此的诗风不同：颜诗“雕绩满眼”(《南史·颜延之传》)；陶诗“质而自然”(严羽《沧浪诗话》)。除颜延之外，陶渊明的朋友还有刘遗民和周续之值得一提。刘遗民遁迹匡山，周续之隐于庐山。陶、刘、周合称为“浔阳三隐”。其实，陶渊明与刘遗民和周续之的心境不同，正如韩愈所说：渊明“虽偃蹇不欲与世接，然犹未能平其心”(《送王秀才序》)。

陶渊明好学，恰如他自己所说：“开卷有得，便欣然忘食”(见《与子俨等疏》)。他学习儒家经典最勤，“游好在六经”。同时，他“心好异书”(《陶徵士诔》)，“六经”以外的诸子百家无

所不读，《和郭主簿》就记录了他读各种杂书的情形：“息交游闲业，卧起弄书琴”。他的思想受到儒家的影响，也受到道家的影响。他积极出仕，是儒家的态度，消极归隐，则带道家的色彩。“少学琴书”，老不释卷，到了去世的前五年他还在读“异书”——《山海经》，兴味很浓。“既耕亦已种，时还读我书”，精神世界是充实的。他读书的方法是独特的：“泛览”、“流观”、“不求甚解”，注意心领神会，不拘泥于词句。陶渊明一生好酒，《陶徵士诔》说他“性乐酒德”，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彭泽归来时，他“有酒盈樽”；后来受穷，“倾壶绝余沥”（《咏贫士》）。当自己醉眼朦胧的时候，他便坦率地对友人说：“我醉欲眠卿可去”（《宋书·隐逸传》）。

二

陶渊明“常著文章自娱，颇示己志”，他的理想、志趣、情操、欢乐、哀愁、愤怒流于笔端。他留给我们的诗有一百二十多首，文有九篇。作品的数量虽不多，但大部分是名篇。他的作品内容充实、风格独特、别开生面，不同于当时的玄言诗、游仙诗，也不同于缺乏社会生活内容的山水诗。由于他的作品不“入时”，当时和他死后一百多年不被重视。为陶渊明立传的沈约不言陶诗，作为文学批评专著的《文心雕龙》对陶诗也一字不提。钟嵘的《诗品》注意到了陶诗，说它“文体省净”，“辞典婉惬”，但把陶渊明列为“中品”诗人。萧统独具慧眼，第一个辑录了陶渊明的作品，并作序推崇，说读了陶渊明的作品“贫夫可以廉，懦夫可以立”。到了唐代，陶渊明的作品引起普遍的重视，许多大诗人直接向陶诗取法。

在宋、清两代出现了研究陶渊明作品的热潮。渊明作品集在宋代的刻本至少有十七种；在清代论陶诗的著述多达百余种。朱自清说过：“中国诗人里影响最大的似乎是陶渊明、杜甫、苏轼三家”（见《朱自清文集》第三册《标准与尺度》）。

陶渊明的创作生活始于何年？很难确知。从保留下来的作品看，出仕之前，只有几篇诗文；出仕期间，他创作了二十余首诗，约占全部作品的五分之一；他的作品，绝大部分是在归田之后写的。

千百年来，陶渊明的作品为人喜爱，不是偶然的，首先在于他的作品的内容充实、独特，新人耳目，特别是以下几点。

其一，厌恶官场，抛弃仕途。

陶渊明年轻的时候有理想有抱负，“猛志逸四海”，希望自己象鸟儿一样展翅入云，顾炎武说陶渊明“有志天下”（《菰中随笔》）。陶渊明的“猛志”是指什么呢？他在《感士不遇赋》里作了回答：“大济于苍生”。为了实现自己的“猛志”，陶渊明曾想去从戎戍边，为国家的统一作一番事业，结束民族分裂的悲剧。他唱道：“少时壮且厉，抚剑独行游。谁言行游近？张掖至幽州”（《拟古》）。偏安的东晋王朝无力完成统一大业，渊明的从戎理想化为灰烬。但是，决意要济世的陶渊明不肯老死穷庐，他在寻找另一种实现“猛志”的途径，这就是“出仕”。一个胸怀大志的知识分子，要想“兼济天下”必须掌握权柄，如果“利剑不在掌”，那是任何大事也做不成的。陶渊明“四十无闻”的时候，还翘盼出仕的机遇：“脂我名车，策我名骥，千里虽遥，孰敢不至”（《荣木》）！

渊明确实步入了仕途，二十九岁时作过“州祭酒”，由于“不堪吏职，少日自解归”（《陶渊明传》）。后来，他作过桓玄的僚佐，刘裕、刘敬宣的参军，彭泽县令。每次做官的时间都不长，作县令仅八十余天，五次出仕前后共十三年，其间大部分时间在家赋闲。彭泽归来后终身不再仕。晋宋易代时征他为著作郎，他称疾谢绝。他在彭泽归来后，总结了五次出仕的教训，说过去都不过是为“口腹”而“自役”，出仕对实现“猛志”不起作用，因而“深愧平生之志”（《归去来兮辞序》）。这是诗人内心深处的悲哀。

彭泽归田前后的几年中，陶渊明写了一些诗，表现了他对官场的厌恶，对田园的向往。初仕桓玄的时候，他当差远行，不堪劳苦，曾写叹行役的诗：“静念园林好，人间良可辞。”“园林”为什么“好”呢？因为“园林无世情”，比“人间”官场干净得多，这就表达了他对官场的厌恶之情。他在桓玄手下做官，后悔不该离开自己的家乡：“如何舍此去，遥遥至西荆。”刘裕平了桓玄，请陶渊明出来做官，陶渊明写了《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》这首诗，抒发他赴职途中欲仕欲隐的矛盾心情，说他这次出仕也只是“暂与园田疏”，“终反班生庐”。在途中，他“目倦川涂异，心念山泽居”，刚刚离开田园，却又想到归故里。第二年八月，陶渊明任彭泽令，十一月他断然辞去，作了《归去来兮辞》，高唱着“富贵非吾愿”的调子回到了园林。他感到自由和愉快，象“羁鸟”回到了“旧林”，象“池鱼”回到了“故渊”。他庆幸自己“实迷途其未远，觉今是而昨非”，并对未来怀有希望，“知来者之可追”。在这种积极情绪的支配下，他纵笔讴歌田园风光，《归园田居》等作品

写出了农村风物的美，使他获得了“田园诗人”的称号。他把园林写得如此的美，如此的令人神往，和黑暗、腐败、倾轧的官场形成鲜明的对照，更深沉地表达了他对官场的厌恶。

为实现“猛志”，渊明曾热心于仕途；当“猛志”不能实现的时候，他就深感“出仕”没有意义。在渊明看来，官场是可怕的：象“樊笼”，似“尘网”，“密网裁而鱼骇，宏罗制而鸟惊”（《感士不遇赋》）。要想平稳地在官场混下去，或者得到升迁，那就要向权贵折腰，会些“机巧”。但陶渊明“少无适俗韵”，“性刚才拙”，“与物多忤”，“机巧好疏”（《与俨子等疏》）。在易代时期，斗争激烈，最高统治者诛杀功臣，时有“鸟尽废良弓”的悲剧发生，陶渊明不寒而栗，认为“觉悟当念还”，在“大伪斯兴”的时代，象他这样“洁己清操之人”，不可久留官场，必须“逃禄而归耕”，“击壤以自欢”（《感士不遇赋》）。对于渊明的“逃禄”轻位，朱熹大加赞扬。他说：“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，然个个要官职，这边一面清谈，那边一面招权纳货。陶渊明真个能不要，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”（《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》引）。

其二，赞美躬耕。

陶渊明熟读“六经”，但并不恪守“六经”。儒家主张“学而优则仕”，渊明并不十分热衷仕途，先仕后隐。儒家轻视体力劳动，渊明却赞美躬耕，偏要“种豆南山下”，自食其力：“人生归有道，衣食固其端，孰事都不营，而以求自安？”（《西田获早稻》）他用自己的诗笔去赞美躬耕，描绘了一幅幅农村劳动生活的图画，使他的作品沾有“夕露”，散发出泥土的香味。一些封建文人写过“渔樵之乐”，但他们不能象渊明

郑诗写自己的躬耕之乐，更不能象渊明那样写自己的躬耕之忧，躬耕之苦，躬耕之怨。写“渔樵之乐”的诗人是劳动的旁观者，而渊明则是躬耕的实践者，他唱出来的是自己的心声。

从官场回到园林，陶渊明感受到了乡居的乐趣和躬耕的欢乐。他具体而形象地描写了这种欢乐，说自己劳动收工后，沿着崎岖的羊肠小道下山，先在溪边“濯足”，然后回家“漉酒”，杀鸡，邀请邻人共进晚餐，用“荆薪”代替“明烛”，欢乐至“天旭”。有时，他站在庄稼地里，看见禾苗长势良好，有丰收的希望，十分高兴。《怀古田舍》写了这种喜悦：“平畴交远风，良苗亦怀新；虽未量岁功，即事多所欣”。当秋收的季节到来的时候，他更高兴了，“不言春作苦”，似乎忘记了往日耕耘的劳累，“束带候鸡鸣”，准备出发去秋收。

在官场，渊明担心“异患”；在园林，渊明忧心庄稼长不好。《归园田居》里写了这种躬耕之忧：“桑麻日已长，我土日已广，常恐霜霰至，零落同草莽。”渊明象老农一样直接关心着自己的劳动成果，忧虑天灾的突然袭击，使自己的桑麻变成“草莽”。这并非杞人忧天，天灾确实给他带来过苦头：“炎火屡焚如，螟蛾恣中田；风雨纵横至，收敛不盈廛”（《怨诗楚调》）。写“渔樵之乐”的诗人可曾写过“渔樵之忧”？即使写过，也远不如渊明写得这样真实，具体，动人！

躬耕有乐，有忧，也有苦。“种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。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。道狭草木长，夕露沾我衣”。淡淡几笔，写出了劳动的艰苦情景。到南山豆地里锄草，晨出夜归，披星戴月，劳动地点是那么远，劳动时间又是那么

长，其艰苦性可想而知。“带月荷锄归”形象极了；“夕露沾我衣”真实极了。这些用汗滴写出来的朴实而美妙的诗句唯独陶渊明的集子里才有。由于长期参加劳动，渊明接近农民，并逐渐同农民有了一些共同语言（“相见无杂言，但道桑麻长”）。他由自己的躬耕之苦想到了农民的劳作之苦：“山中饶霜露，风气亦先寒。田家岂不苦？弗获辞此难”（《西田获早稻》）！彭泽归隐之前，渊明也参加过农村劳动，那时还不至于体会田家的辛苦，还在那里“秉耒欢时务，解颜劝农人”（《怀古田舍》）。而现在，他不是“劝农人”，而是站出来为田家呼喊：“弗获辞此难！”对于渊明来说，躬耕是苦的，但却苦中有乐，因为“四体诚乃疲，庶无异患干”。较之官场的“异患”，躬耕之苦又算得了什么？诗人一面写躬耕之苦，一面又揭露官场的险恶，两者对照，使作品更有深度。

渊明逃禄躬耕，以“田桑”为业，岁岁年年辛勤劳动，但仍然“寒馁”加身，不得温饱，用“粳粮”果腹和用“大布”御冬这样最低的生活要求也满足不了，使渊明产生了躬耕之怨：“人皆尽获宜，拙生失其方”（《杂诗》）。对这种不公平的社会现象渊明无法改变，他感到难以生存，但连个说理的地方也没有：“理也可奈何，且为陶一觞。”这里，诗人已接触到了一个社会问题：劳者不获，贫富悬殊。对于不劳而获的剥削者，诗人在自己的作品里发出了怨声。如果渊明不去躬耕，他对社会的观察就不会这样深刻，也就发不出这样的怨声，写不出这样反映苦难现实的作品。

其三，表现了固穷守节的道德情操。

彭泽归田时，渊明的家境尚好，“童仆欢迎”，“有酒盈

樽”，度日还不难。有了这些物质基础，他才可以“采菊东篱下”，要不，会象鲁迅先生说的那样饿死在东篱旁边。由于归田，失去了俸禄，家境一年不如一年，特别是在遭了火灾之后，损失巨大，一家人以船为家。后来又遭风灾，水患，虫害，他穷到“夏日长抱饥，寒夜无被眠”的程度，甚至不得不去“乞食”。

穷困考验着陶渊明！

如何才能摆脱贫困？最便捷的办法是重返仕途，再食俸禄，好心的田父也曾劝他“纡辔”再仕，不必“继续茅檐下”。但是，他的归隐意志坚定：“吾驾不可回”。当躬耕很苦，累得吃不消的时候，他的思想也不动摇，唱道：“衣沾不足惜，但使愿无违”，“躬耕非所叹”。当遭了火灾的时候，家里穷困，他还是要“辞华轩”，安心地“灌我园”。渊明去世的头一年，贫病交加，江州刺史檀道济去探望他，颂扬他是“贤者”，劝他出来做官；他一个软钉子碰回去：“潜也何敢望贤”。檀道济馈赠梁肉，渊明“麾而去之”（萧统《陶渊明传》）。一面拒收馈赠，一面又叩门“乞食”，这就展现了陶渊明的品格和气节，他宁肯穷得要饭也不重返仕途，“宁固穷以济意，不委曲而累己”（《感士不遇赋》）。他在《咏贫士》里还说：“贫富常交战，道胜无戚颜”。他在临死前一年在《有会而作》中特意把他的饥乏写了下来，他说：“今我不述，后生何闻哉！”他“述”了些什么呢？“述”他“弱年逢家乏，老至更长饥”，老而受穷是一种悲剧；还“述”他在饥饿难忍的时候想也许有黔敖那样的人出来施舍“嗟来之食”。但是，转念之间，他又觉得“嗟来之食”吃不得：“斯滥岂攸志，固穷夙所归。”渊明作品里

表现出来的固穷守节的道德情操与一般的“安贫乐道”思想不同。安贫乐道是要人安于现状，对不合理的现实不置一词；而渊明的固穷守节是一种道德情操，在当时含有反抗意识，是他“有志不获骋”以后对黑暗现实的无声抗议，表现了诗人的气节、情操、人格。昔日彭泽辞官的时候，他不为五斗米折腰；如今老死穷庐的时候，他不食“嗟来之食”，这些都说明渊明有不与统治集团合作的傲骨。

其四，展示了美好的社会理想。

陶渊明所处的晋宋社会是一个动乱的社会，战争频仍，生灵涂炭，渊明的故里乡亲几乎死光了，“邻老罕复遗”，留下一片废墟，“井灶无遗处，桑竹残朽株”（《归园田居》）。这个社会的风气败坏，“大伪斯兴”，“举世少复真”，而且极不公平，贫富悬殊。陶渊明通过写自己的种种不幸来揭露社会的黑暗，统治者的凶残；通过写自己的穷困来反映人民的穷困。他“念黄虞”，忆“羲农”，不是要回到往古社会，而是要否定眼下的黑暗社会。他歌咏荆轲、“三良”、“二疏”、夸父、刑天、精卫等等历史人物和神话人物，意在盼望现实社会里也有这样的人物出现。他骂“秦氏乱天纪”，实际上是指斥在位的统治者。

到了晚年，贫病交加的陶渊明对现实社会观察得更深，同时也就更不满意和更加憎恨了。这时，他的“念黄虞”的思想发展了，在他的脑子里产生了一幅美好的社会理想的蓝图，这就是虚构的超越尘世的“桃源社会”。他那一支优美的笔写出了《桃花源记》和《桃花源诗》，把美好的社会理想形象细致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。长期以来，苦难的人们追求美好的

社会理想，希望找到一块无剥削无压迫的“乐土”。《诗经·硕鼠》就歌唱过这样的“乐土”。不过，“乐土”是个什么样子？作者并未具体描绘，显得抽象。渊明笔下的“桃源社会”则是具体的“乐土”，它是具体化了的“大同世界”，也是具体化了的“黄虞时代”、“羲农时代”。在这个理想的桃源社会里没有国君和王税，人人平等，大家劳动，这里是一个幸福的极乐世界，“童孺纵行歌，斑白欢游诣”。美好的桃源社会同丑恶的现实社会形成鲜明的对照。这样，自然会引导人们向往理想社会，否定黑暗的现实社会。从这一点说，《桃花源记》有其历史的进步性。

在陶渊明的整个作品中，就内容来说，主流是积极的和健康的，值得肯定；但也有消极的和颓废的一面，应当否定。“酒能祛百虑，菊解制颓龄”（《九日闲居》），“在世无所须，惟酒与长年”（《读〈山海经〉十三首》），“但恨在世时，饮酒不得足”（《挽歌诗》），还说“今我不为乐，知有来岁不？”这些诗句确实令人“醉昏昏”，感到颓唐的气氛。但也不可夸大这些部分，不可据此断定渊明在劝人“及时行乐”。读读《形影神》便可知道，他是反对及时行乐的。

三

陶诗的内容独特新鲜，它的艺术技巧也很有特色。秦观说它“冲淡”（《淮海集》卷二十二），朱熹说他“豪放”（《朱子语类》），严羽说它“质而自然”（《沧浪诗话》），苏轼说它“质而实绮，癯而实腴”（《与苏辙书》）。陶渊明写过一些田园诗，用淡雅朴素的语言表现了愉悦闲适的心情，象云中展翅的仙

鹤，确实给人“冲淡”的感觉。渊明到了晚年，生活穷困，病魔缠身，又碰上晋宋易代，心里充满悲愤，写了一些咏史诗，缅怀古代英雄，慷慨悲歌，它确实“豪放”。大体上可以说，渊明前期的作品是比较“冲淡”的，后期的作品是比较豪放的，不可单以“冲淡”或“豪放”来概括渊明的全部作品。龚自珍说得好：“莫信诗人竞平澹，二分《梁甫》一分《骚》”（《定庵文集补·杂诗三首》）。苏轼的说法比较中肯，“质而实绮”，道出了陶诗的语言特色：从外表看来，陶诗的语言十分朴素，不惹人注目；实际上陶诗的语言很美，深藏着诗人的匠心。“质而实绮”，是说陶诗的内容充实而富有弹性。乍看，陶诗显得枯瘦；仔细品味便觉得陶诗的内容厚实。苏轼的这两句话言简意赅，指出了陶诗语言美和内容美的主要特征。

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，对陶诗的艺术特色，我们可以这样概括：真实婉转，朴素自然，浑厚玲珑。

真实婉转：在内容上，陶诗所表现的思想感情是真实的，描写的景物和环境也是真实的。元人陈绎说陶诗“情真，景真，事真，意真”（《诗谱》），不“矫揉造作”，更不“无病呻吟”。他的全部诗文是他的自我写照，他一生的生活、思想、情绪、哀乐都在作品里得到了真实的反映。渊明有一颗诗人的赤子之心，在作品里不掩饰自己的内心世界，有苦道苦，有忧说忧，笔如其口，口如其心。为桓玄当差，日夜兼程，颇以为苦，他就写诗叹行役；居官不自由，一旦归田便欣喜若狂，不断写诗著文为自己庆幸，一个欢乐的陶渊明跃然纸上；归田后与农民交了朋友，心里高兴，提笔赞美“披草共

来往”的友谊；到了晚年，又贫又病，他就写自己怎样不得温饱，怎样去“乞食”，怎样怀才不遇，怎样悲苦；眼看要归“本宅”了，他就写了告别人世的《自祭文》和《挽歌诗》。这些方面的作品在内容上给人以真实的感觉，真实铸成了陶渊明作品的生命。他的抒情作品，同时又是个性化了的作品，他笔下的孤松、秋菊、幽兰、飞鸟、孤云都是人格化了的，投进了诗人的影子，是陶渊明人格的再现，寄托着他的理想和情操。

陶渊明作品里的真实感情和真实思想有时是直接表现出来的，如泣如诉，披肝沥胆；更多的时候是间接表现出来的，婉转达意，含蓄而富有韵味。诗是这样，文也是这样。《五柳先生传》结尾写道：“无怀氏之民欤？葛天氏之民欤？”生活在东晋社会的“五柳先生”为什么想做古代社会的“无怀氏之民”、“葛天氏之民”呢？岂不是作者含蓄地通过“五柳先生”表达了他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情绪吗？“幽兰生前庭，含薰待清风”（《饮酒》），这里的“幽兰”就是陶渊明自己，“含薰”，是说自己如同屈原一样具有“内美”，“待清风”是说他在期待着“时运”。诗意是含蓄的。晋宋易代后，渊明对晋室有一种怀旧的依恋之情。直接说出来，自然不会有韵味。陶渊明是用托物言情的艺术手法来表达的。《拟古》诗的第二首：“仲春避时雨，始雷发东隅。众蛰各潜骇，草木纵横舒。翩翩新来燕，双双入我庐。先巢故尚在，相将还旧居。自从分别来，门庭日荒芜。我心固匪石，君情定何如？”春天到了，燕子归来。燕子不嫌旧居门庭荒芜，还是寻找“先巢”。寻“先巢”的燕子就有诗人的影子。结尾很妙，诗人向燕子发问，表白自己也

象燕子一样依恋着“先巢”，说明他对灭亡了的晋室有怀旧之情。

朴素自然：是说渊明作品的语言特色。东晋诗坛被玄言诗统治着，晋宋易代后，山水诗取代了玄言诗。玄言诗用诗的形式宣扬老庄哲学思想，犹如哲学讲义，没有诗的形象和想象，语言平板、枯燥。钟嵘在《诗品序》里批评玄言诗“理过其辞，淡乎寡味”，“平典似道德论”，如著名玄言诗人孙绰《答许询》：“仰观大造，俯览时物。机过患生，吉凶相拂。智以利昏，识由情屈。野有寒枯，朝有炎郁。失则震惊，得必充诎”。这样的玄言诗既不言志也不抒情，感染不了读者。陶渊明无论言志和抒情，都能动人心弦，而且语言朴实有味。“春秫作美酒，酒熟吾自斟，弱子戏我侧，学语未成音”（《和郭主簿》）。这些语言朴实极了，自然极了，但这朴实的诗的语言准确地传达出诗人的喜悦之情，使你觉得句句可爱。陶渊明驾驭语言的能力是过人的，在他的作品里，把日常生活，家庭琐事都用朴素自然的诗的语言表达出来了。

前人论诗常爱把陶渊明的作品与谢灵运的相比较，是有道理的。他们的作品都和玄言诗不同。比陶渊明小二十一岁的谢灵运是山水诗人的杰出代表。他以山水为题材，写出了许多美丽的山水诗，扩大了诗的创作领域，推动了诗歌的发展。他驾驭语言的能力也很强，描写景物逼真细致，名句甚多，读后留下的印象难以磨灭。如“池塘生春草，园柳变鸣禽”（《登池上楼》），象是信手拈来，自然可爱。“近涧涓密石，远山映疏木”（《过白岸亭》），对景物的观察细致，描写逼真，宛如写生画。清人马星翼《东泉诗话》说：“陶诗以自然为贵，谢